

绪 论

国际格局研究的重要性及其特色

国际格局是我国国际关系领域“研究时间最长，著述最多，争论也最多”的问题，在雅尔塔格局瓦解和冷战结束后，这一问题再次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①。尤其是，在近年来相继爆发科索沃战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情势下，国内学者围绕着国际格局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冷战后到底是多极化趋势加强，还是正在出现以美国霸权为标志的单极格局，抑或是已经形成某种“多极—单极并存”的复合型格局；在两极格局瓦解的基础上，未来又将形成什么样的国际格局。同时，这些问题还被引申到国际格局构成、结构类型和作用规律以及转换方式等更深的层次。无疑，这些都加深了对国际格局的理论探讨。与此相对照，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就国际格局问题所发生的近期争论，则存在着两种值得关注的不同理论导向。一方面，在 20 余年的时间里，作为两大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论战。在这场著

^①参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学习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81 页。

名的“新一新论战”(the neo-neo debate)中,国际格局或国际结构问题曾经是激辩的重点,但它后来还更多地涉及到国际结构与过程、国际结构与国际制度、国际合作与国际冲突等问题。另一方面,西方现实主义学派对国际格局的结构类型、国际格局与国际关系稳定的关系始终兴趣不减,特别是“单极稳定”还是“多极稳定”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讨论的核心话题^①。由此可见,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近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二条理论发展线索,即现实主义(包括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线索是相当吻合的,两者在理论上的“共振现象”反映出国际格局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在国际格局问题上存在着不小的争论,但国际格局这个概念在中国远比在西方受到了更多的偏爱,国际格局研究的重要性在中国学者眼里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依照中国学者的研究逻辑,国际格局是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基础性概念之一,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问题研究中最重要研究对象之一;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研究国际格局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的开始^②。同时,国际格局还是中国学者经常使用的分析工具。无论是剖析国际关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还是分析具体的国际问题和国际形势,抑或是

^① 一般而言,现实主义主张“多极稳定论”,新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主张“两极稳定论”,而近来值得关注的是新古典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单极稳定论”。

^② 参见冯特君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研究各国的外交政策，人们常常会把它们放到国际格局的基本框架中加以把握和观照，并且十分重视以此展开自己的分析。应该说，这种状况反映了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重要性的认知既涉及到基本理论层面，也涉及到政策和实践层面。具体而言，国际格局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探索和揭示国际关系规律的主要路径，因而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同时，它也是制定国际战略的基本依据。

（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

国际关系有没有规律，有着什么样的规律，一直是争执不休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虚无主义把国际关系看作是混乱现象的堆积，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总是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混乱状态”；基于这种看法，它甚至认为由于国际关系具有“纯自然主义”的性质，是没有什么规律可言的，只有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才可以解释长久以来的国际关系。因此，研究者不需要花费力气寻找什么规律，也不可能形成什么理论。还有许多西方学者把国际关系视为一种“游戏”，认为国际格局及其过程尤其表现出某种近似于游戏的特点^①。所谓“游戏”可能蕴含着国际关系的某种规则（the rule of game），但它们并不必然带有规律性的特征。此外，那些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区分的学者则认为，国际社会的复杂性使得人们无法寻找可受控的实验条件和环境，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程度，在这一领域也不存在可以被认知的所谓普遍规律。

以上这些忽视或轻视国际关系规律的观点，影响了一些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态度。奥兰·扬（Oran Young）就坚

^① 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561页。

持认为，在国际关系中没有什么有效的或普遍的理论，人们也不可能期待这种理论的成型。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则认为，我们一直称之为“理论”的东西，仅仅是普遍的“概念化”，或者是这一领域的种种取向^①。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虚无主义有所不同，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表面上注重对规律的探讨，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很难迈过时事追踪、形势动态和策论应对的“研究门槛”，所以研究者基本上滞留于国际问题的研究浅层。理论研究虽然常常把探寻规律挂在口头上，但对国际关系发展规律的探讨显然是不够的。而且，迄今为止，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国内还未形成像样的系统理论。

实际上，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国际关系同样存在着自身的客观规律，而且这种客观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或者用新现实主义的话来讲是可以被“发现”的。问题是在认识或“发现”它们时，必须找到恰当的理论途径。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大量浮露于表面的现象。尽管这些现象错综复杂、千变万化，但国际关系的规律绝不是现象的堆积，相反，它隐藏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存在于国际关系的深层和内里，反映的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寻找国际关系的规律必须超越表面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新现实主义者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隐藏在国际现象背后本质性的或者说规律性的东西就是那些重复出现的类型，国际关系理论就在于探索重复出现的类型^②。同样，另一位新现实主义者吉尔平（Robert T. Gilpin）在解释国际体系的变革时

^① 参见 [日] 星野昭吉著：《变动中的世界政治》，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5 页。

^② 参见 [美] 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第一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也认为,那些反复出现的形式,具有共性的要素和总的发展趋势,对认识世界政治的重大变革是重要的^①。

为什么说在国际关系中重复出现的类型或形式是重要的呢?在具体解释什么是规律时,沃尔兹说明,规律只有一个简单的、并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定义,即规律是在变量之间建立的联系,变量是可以采用不同价值标准的一些概念。假设 a , 则出现 b , a 代表一个或多个自变量, b 代表因变量。在形式上,这就是对规律的表述。如果 a 和 b 之间的关系是恒定的,规律是绝对的;如果关系虽不恒定,却是高度稳定的,规律就可以这样表述:假设有 a , 则以概率 x 出现 b 。一项规律的基础不单是某种被发现的关系,而且是一种被反复发现的关系。反复出现产生一种期望,即如果我将发现 a , 则以特定的概率我也将发现 b ^②。沃尔兹的研究逻辑意味着,国际关系“应该被想像为一个有界限的领域或王国”,在这里人们能够发现像规律那样的经常发生的事情。其中,重复出现的类型或形式由于反映了各种变量(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概率关系,所以它们可以被认为是某种规律的反映,或者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讲,它们是事物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的反映。

按照理论的本质,国际关系理论是国际关系规律的集中和组合,也是对国际关系规律的有力陈述和系统反映。但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作为行为单元的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表现千变万化,人们如何通过揭示上述内在的联系来发现和认识国际关系的规律,从而去建立国际关系理论

^① 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② 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呢？应该说，如果把重复出现的类型作为某种规律的直接体现，并把对它们的集中或陈述看作是建立国际关系理论模式的基本条件，那么，在这方面，国际格局的研究便提供了一种极大的可能和现实的途径。因为通观国际关系的历史，在国际关系重复出现的类型中，国际格局具有极佳的表现力。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某种结构类型的国际格局经常重复出现，例如，多极格局和两极格局就曾多次重复出现过，前者如 1648 年后出现的威斯特伐利亚格局、1814 年后出现的维也纳格局和一战后出现的凡尔赛—华盛顿格局，后者如两次世界大战前的两大军事集团格局和二战后的雅尔塔格局。多极格局和两极格局不但多次重复出现，而且它们一经形成就会表现出长期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它们的结构是不会变化的。因而，不断重复出现、一旦重复出现就具有稳定性这双重特征使国际格局在各种重复出现的国际现象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第二，某种结构类型的国际格局在重复出现后，还可以重复发挥自身的作用。由于国际格局的结构始终存在着对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所以在国际关系中所出现的各种重复现象，无论是各种外交活动形式、结盟、伙伴关系，还是军备竞赛、战争准备以及战争本身等，它们都与不同结构类型的国际格局有着某种对应的关系，如在多极格局中国家注重外交活动和政治结盟等，而在两极格局中则容易采取军备竞赛和军事结盟等行为模式。这说明，国家通常所采取的重复行为必然受制于相应结构类型的国际格局，换言之，某种结构类型的国际格局结构必然发挥着其可以重复的作用。第三，不同结构类型的国际格局经常发生相互之间的转换，这种转换是按照一定的发展脉络进行的，因而同样表现出了某种重复出现的现象。

对于以上三种由国际格局结构的连续性所产生的重复出

现的现象，我们在研究上同样可以归结为三种重复出现的规律：第一，国际格局的结构配置规律。这一规律表明，国际格局形成几极结构和它们在什么情况下会重复出现都不是随意的，而是按照内在的结构逻辑安排的。这种结构性逻辑促使了某些重要的和持续不变的结构类型的出现，如多极格局或两极格局。第二，国际格局的作用规律。国际格局所产生的作用是结构性的，即结构从它对国家（单元）的行为及其结果所施加的控制和影响来讲一直是存在的，在重复出现的国际现象中它充当了约束性和分配性的力量^①。当然，不同类型的国际格局（涉及到大国之间的组合数目）对国家（单元）行为的控制和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因而它们对国际关系的稳定性，特别是对战争与和平的后果也可能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这种重复出现的作用和影响可能表现在：某些结构类型的国际格局具有促使和平或稳定的导向，另一些结构类型的国际格局具有促使战争或不稳定的导向。第三，国际格局的转换规律。国际格局从一种结构演变到另一种结构，并不是简单的结构互换，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从此岸到彼岸发生演变的。一般而言，国际格局的结构转换既有可能以战争等暴力形式出现，也有可能以和平的形式出现，但它必然是在国际关系基本矛盾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对于以上三种规律，我们将在后面进行更细致的探讨）。

毫无疑问，国际格局结构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于认识国际关系来讲是有意义的。它解释了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类型和特征重复出现的现象，也解释了国际关系基本矛盾的

^① 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0—81 页。

运动方向和形态，因而它可以帮助人们通过认识这些重复出现的现象背后所隐含的东西，去寻找某种国际关系的一般规律。具体而言，当研究者把国际关系中纷繁复杂的现象放到国际格局范围时，就能够系统地发现，在不同时期，不同结构类型的国际格局的重复出现及其相互演变都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基本脉络和演变方向，反映了国际关系的互动状态中国国家行为的模式，也反映了个别国家与大多数国家之间在对外战略和外交行为上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情况。进一步地说，人们根据某种重复出现的类型和形式，不仅能够了解国际关系中所发生的事实，而且能够认识发生这些事实的原因和条件，甚至也能够预期到某种重复出现的结果。正是由于国际格局在国际现象与本质之间、在发展过程与结果之间架起了桥梁，也在不同类型的关系之间建立了必然联系，所以循着国际格局这条理论途径，人们能够加强对国际现象中重复出现的类型的认识和把握，从而使自己对国际现象的认识上升到规律性和本质性的高度。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可以说，国际格局是认识国际关系规律的主要路径，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而国际格局理论则是对国际关系规律具有极高清晰度的强有力的揭示，或者如沃尔兹在谈到均势理论时所说的，是国际关系领域里的“唯一够格的理论”，^①

（二）制定国际战略的基本依据

新现实主义者吉尔平曾经指出，作为现实主义流派当然

^① 沃尔兹对均势理论的评价极高，认为它是国际关系领域如同物理学理论那样的“唯一够格的理论”。因为均势理论具体解释了不断重复出现的均势局面（它即使遭到破坏也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恢复或建立起来）。而我们知道，均势理论在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那里就是国际格局理论。

的和基本的前提，国际体系结构（即国际格局结构）对国家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这种观点并非要求人们接受关于外交政策至上的现实主义宿命论公式，以及把国家利益仅仅等同于对权力的追逐的观点，但是国际体系结构确实是外交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①。国内学者也认为，国际格局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作为国际战略力量有机联系的整体，国际格局的划分是观察世界和考虑整个国际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一个国家自我认识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依据，因而是制定国际战略的决策依据之一^②。

一般而言，国际格局之所以是制定国际战略的基本依据，乃是因为：

第一，国际格局是国家界定其国家利益的基础。我们知道，各国国际战略的核心是国家利益，而其目标是国家利益的实现。由于各国都处在一定的国际格局中，它们的国家利益都处在一种横向比较和相互竞争中，因此，它们都只能根据自己在格局中的相对位置和权力资源来判断和界定国家利益。沃尔兹指出，有一个虽然简单但很重要的道理，即国家是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行事的，而且它们总是在试图满足国家利益所需的条件。“国家利益的概念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外交行动和军事行动必须时常加以周密计划，以免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③但是，国家采取适当行动时的根据是它所处的国际结构，包括其他国家的反应。因此，在判定国家利

① 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② 参见金应忠、倪世雄著：《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页。

③ 〔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163页。

益时，国际结构是国家必须加以考虑的首要问题^①。沃尔兹所说的国际结构，也就是我们讲的国际格局。只有在国际格局中准确判断和有效界定国家利益，才能进一步满足和实现国家利益的需要，从而把国际战略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基于此，各国注重的是由国际格局所界定的、而不是别的什么界定的国家利益，并把它视为自己制定国际战略的核心要素。

第二，对国际战略的制定来说，国际格局是一种无法回避的最基础和最系统的国际环境。所谓国际环境包括国际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及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由于国际格局最具有结构性，所以它在整个国际环境中是起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由于国际格局高度包容着国际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及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所以它也是最系统的国际环境。对于国际战略来讲，国际格局之所以无法回避，是因为国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在由世界各国所构成的国际环境之中，首先是处在国际格局之中。因此，国际格局的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和偏向为转移，国际战略通常伴随国际格局的存在而存在，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而进行重大调整。无论是国际战略的制定过程，还是调整过程，它们只能顺应国际格局的现实和变化方向，而不能悖逆国际格局的现实和变化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讲，国家的国际战略只能是对国际格局提供的最基本环境所作出的反应或“回应”国家要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必须首先在所有国际环境和条件中准确地把握国际格局的结构；国家要适时地调整国际战略，必须首先准确地把握国际格局的变化。相反，

^① 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

对国际格局及其变化的判断错误将导致整个战略判断的错误。历史经验表明，1949年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都高度重视国际格局，把它作为最基本的国际环境来加以对待。而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大三角和多极化等国际格局的划分，都是对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准确判断，曾成为中国制定国际战略的前提。20世纪70年代，当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苏联的巨大威胁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审慎分析了国际环境，及时作出了大三角格局已经出现的正确判断，从而制定出联美抗苏的战略，迅速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大大改善了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不利处境。事实证明，联美抗苏的战略是对国际格局的大环境进行恰当把握之后作出的正确选择。相反，在二战之前，英国对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即由多极向两极的变化）没有正确的认识，遂以绥靖外交对希特勒德国进行妥协，因而姑息纵容了希特勒的战争行为，损害了英国自己的国家利益。究其原因，乃在于英国的国际战略的制定基于对国际格局的错误判断。所以，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说明，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国际环境，国际格局是国家制定国际战略的前提和依据，是国际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国际格局是国家正确估计自身力量和所处位置的基本依据，由此成为作出恰当的国际战略选择的必要条件。国际格局既表明了力量对比，又表明了国家相互间的位置。各国主要依据自身力量和自己所处的位置，而不是其他条件来确定自己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制定国际战略。不能正确认识自身力量的战略是不现实的，同样，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所处位置的战略也是不现实的。例如，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对自己国家的力量和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在冷战末期便采取了侵吞科威特的扩张行

径，导致了美国和多国部队发动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和实行长期的经济制裁，并最终使萨达姆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中丧失了政权。因此，只有认清和把握国际格局，才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多种力量和多种角色彼此作用和变化的状况，才能正确估计自身的相对力量和位置，从而在找准自己位置的基础上相应作出恰当的选择。引申而论，国际格局之所以是进行国际战略选择的必要条件，恰恰是由于它从结构的角度给国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位置蓝图或坐标。没有这些，国家便缺乏认识上的准星，无法寻找自己的方位，也就谈不上进行国际战略的选择。正如现实主义关于结构的逻辑所揭示的，国家只有对力量对比问题和自己所处位置有所认识，才能采取睿智的外交^①。

总之，国际格局在国际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国际格局的判断和运用是制定和执行国际战略的基本前提和逻辑起点。不同的国际格局会反映出不同的国际关系规律，从而导致形成不同的国际战略。正因为如此，一个国家必须“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这恰恰是对国际格局与国际战略之间辩证关系的准确反映。质而言之，谁不重视国际格局的重要地位，谁就有可能失去理论上的洞察力，谁就有可能失去战略上的主动权和先见之明。

二

在国际关系基本理论中，国际格局固然是重要的，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就是：由于受到

参见〔日〕山本吉宣主编：《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64页。

长期以来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的影响，国际格局的研究明显地具有现实主义的理论属性和取向，有关国际格局的概念和范畴被深深地植根于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假定之上，有关国际格局的理论通常采用现实主义的分析逻辑，同时它们还被现实主义导向了同外交政策的实用联系。在比较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和局限性时，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曾经指出，在战后的岁月里，现实主义席卷了美国国际关系领域，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政策的语言，很大程度上由现实主义所独揽。由于现实主义是连贯地分析世界政治的必要组成部分，因而它对权力、利益和理性的着重研究，对从任何角度理解世界政治和国家行为问题都至为关键。国际关系的任何研究方法都必须吸纳或至少要认真对待现实主义的根本性洞见和思维要素。然而，现实主义在面对特定条件下的国家行为的种种问题时，没有能够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它也特别不擅长于解释变化^①。这说明现实主义本身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必然影响到国际格局的理论品质。虽然新现实主义，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对国际格局做了新的解释，但它仍然未能完全脱离现实主义的固有传统。

（一）国际格局与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

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有三个：第一，无政府状态（anarchy）的假定。这一假定说明，由于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没有世界政府或中央权威凌驾于国家之上，所以国家是国际关系的最基本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国家共存”的关系。这一假定实际上是“国家中心论”的假定。

^① 参见〔美〕罗伯特·O. 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145页。

第二，理性主义假定。现实主义强调用无政府状态来解释国家的动机与行动，因为前者对后者有着明显的限制作用。但恰恰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是统一的（或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通常采取广义的理性政策。尽管国家处于国际关系的不确定的条件下，可能由于信息稀缺和外交欺骗等原因而难免出现失算，但它们倾向于用心权衡各种不同政策选择的成本，按照国际关系中的成本和需求规律办事，以期获得预期效用的最大化。这种理性逻辑所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国家将产生持续的和稳定的政策偏好，并根据这种偏好诉诸自己的行为。第三，权力政治的假定。现实主义把权力或实力看成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因素，国家尽其努力追求权力或实力，蓄积或保持足够的权力或实力。它们根据权力来计算利益，不管这种权力是作为目标还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手段。就此，人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还是沃尔兹，都求助于权力与均势的分析逻辑，并以此塑造出现实主义关于权力政治的系列理论^①。应该说，以上所说的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对国际格局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借助这些基本假定，有可能理解国际格局形成和变化的基本原因和背景，也有可能从国际格局的结构类型中推测出国家的行为模式。正是由于国际格局研究接受了这三个基本假定，所以它被纳入了现实主义的理论范畴，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范畴。

实际上，国际格局的研究正是在遵循无政府状态和理性原则的假定下，更多地沿着第三个假定而展开其逻辑的（这

^①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Winter 1994/1995, p. 337.;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estview Press, 1989, p. 40.

正好也与沃尔兹关于结构的第三种定义相对应)。由于在无政府状态的前提下国家以理性的原则采取行动,所以,权力和利益就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核心因素,并且确实始终对国际格局存在着重要的影响:第一,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在国际关系中“以权力划定利益”意味着,只有在国际格局及其变化中才能界定国家利益。第二,权力关系体现了国际格局的基本结构。无论是权力关系的总体配置形态还是国家间的支配与从属关系,抑或是这些关系的质与量的过程,都是国际格局基本结构及其变化的反映。第三,国际和平的形成和维持依赖于权力均势,即国际格局的结构平衡。权力均势或国际格局的结构平衡对战争与冲突的制约反映了权力因素所经常发挥的作用。就此而言,国际格局一直同国际关系的稳定性,包括战争与和平问题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当然,尽管现实主义认为其关于权力政治的假定对国际格局研究确实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假定仍然有过分夸大之处,例如,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就把国际政治、以至于一切政治都解释成“争夺权力的斗争”^①。其他现实主义者则把国际关系历史看成是以权力关系为中心的历史,并试图仅仅在权力范围内对国际政治现实进行分析。这种主张权力万能的观点,简直形成了现实主义意识形态的顽固症结,也使其带有以静止和保守为特征的局限性。而这正是今天新现实主义扬弃和新自由主义批评的所在。

(二)国际格局与外交政策

二战以来,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深刻

^①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p. 64—73, 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 1948.

地影响了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但显然现实主义的影响是更为直接的（建构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主要缘自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的本能特性，即它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实用性思维特质。基欧汉在谈到这一点时认为，现实主义思维的引人之处，在于其对国际关系中实际问题的应用性。它为那些致力于理解和应付其国家安全所受的潜在威胁的人们，提供了一系列一目了然的措施^①。考克斯（Robert W. Cox）在谈到作为“问题解决型的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的现实主义时，认为该类型理论的一般目标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成为一种指导，帮助解决问题，并且通过有效地对付制造麻烦的具体原因，来推动政策的顺利运作^②。毫无疑问，现实主义的本能特性及其在理论和政策中的地位都严重影响了国际格局的研究取向，使得它侧重于政策性研究，并把研究的重心和归宿放在对政策问题的影响上。人们所熟知的摩根索、沃尔兹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人物，尽管在学术象牙塔里创立了理论，但他们均希望自己的理论能够保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恰恰是他们在塑造自己关于国际格局的理论（主要是均势理论）时的主要兴奋点之一。而被斯派克曼（Nicholas J. Spykman）视为现实主义两大理论支柱的均势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③，在与外交政策的互动方面更是技高

^① 参见[美]罗伯特·O. 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② 参见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04—254.

^③ 参见倪世雄主编：《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一筹。20 世纪 70 年代，它们在两个学者兼政治家型人物的手上得到了直接的应用，基辛格的均势理论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地缘政治理论既深刻影响了当时美国的外交政策，又深刻影响了当时美国的外交政策实践。我们知道，这两种理论都属于国际格局的范畴，是国际格局在内容和空间上的直接体现。应该说，从摩根索到沃尔兹，在现实主义的整体氛围中，国际格局问题被相当自然地引入了理论与政策紧密联系的领域，国际格局研究也与外交政策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也产生了国际格局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很难相互区分的弊端。

（三）新现实主义^①对国际格局概念的改造和演绎

需要指出的是，新现实主义在无政府状态、国家利益、自助与均势等传统理论要素方面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但也对这些理论要素做了适当的修正，这就在于它以体系结构的核心观点和系统逻辑对它们进行了重新的整合，从而对国际格局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进行了一番更属于“结构”（structure）意义上的新的改造和进一步的演绎。因此，新现实主义，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较为完整和准确地描述了国际格局（即国际体系结构）。它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修正从两个方面加深了对国际格局的认识。

第一，与传统现实主义依据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概念所形成的“权力政治观”不同，新现实主义把体系结构当作自己理论的核心概念，并完整地形成了所谓“结构政治观”。按照“结构政治观”，国际政治即被视为一个定义精确的体

^①新现实主义一般分为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格里科的新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三种。但本书在说到新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是在同样的意义上来使用的。